

# 中原时评

■个论

## 死磕“铁饭碗”是场偏执的旅行

2014年度“国考”落幕。本次招考,152万人通过报名资格审查,其中111.95万考生走进考场,40余万人弃考。

“国考”大军浩浩荡荡,狂热“公考热”的背后,是每个人对个体命运的思索和人生道路的选择。而审视每个人的动机,不难发现里面充满着幻想和梦想的碰撞,充满着忧思和迷思的纠葛。

“死在编制里”的呐喊,曾引发无数人的唏嘘。而最近,28岁宁波考生小陈“连考6年不言败”的坚持,以及“坚持到不能报名为止”的执着,再度引发公众的思考:体制内,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魔力?

这种“死磕”的韧劲,甚是令人折服。但凡在任何岗位和道路上,依着这股韧劲,恐怕都能有所作为;而6年甚至更长的时光,必定可以无限接近自己的梦想。从做分母到做分子,正是大浪淘沙砥砺的结果。

执着与偏执的界线,在于道路的选择。似乎,从未有人说过,考公务员不是正确的选择。关键在于,考公务员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。如果是有从政理想、热心于公共服务,那么无疑是社会之福;但如果只是想象“一考无忧”,追求特权庇护

与灰色福利,那无疑将消解社会活力的奔流。

小陈死磕“铁饭碗”,是向往体制内的优越,追求想象中的“顺风顺水”。甚至以为,作为大龄青年,进入体制,找对象都会更有优势。在逼仄和窘迫中突围,站在不公食物链的顶端,寻找安稳无忧的桃源,小陈的向往,或正是不少体制竞争者的想象。

但这种想象中的路径,谁能保证不是冒险的旅程?原因在于,附加在“铁饭碗”的权力红利正在消失,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,也意味着“铁饭碗”不再坚不可破,体制内也将不再养尊处优的处所。

“为官发财,应当两道”。无论是十八大后的治腐风潮,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信号,都预示着公务员身上的权力红利将逐渐消失,而“国考”大军们执着和信奉的安稳和优越将被打破。“让人民监督权力”“把权力在阳光下运行”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”……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强化,权力特享的奶酪,势必越来越小;公务员的“油水”,势必越来越薄。如此情境下,继续狂热于体制,继续想象权力红利,考生们的执着显得越来越不理性,

也显得越来越不现实。

通过公务员考试,成为社会分母之上恒定的、优越的分子想象,正在改革的转向和特权的制约中慢慢瓦解。可遗憾的是,不少年轻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,依然在执着地追逐体制,以图庇佑。这种执着,是否因为道路的盲目,而异变成了偏执呢?而事实上,寻求特权庇护甚至升官发财,无论何种情境下,都未必是正确的选择,对权力红利的觊觎,本质就是一种危险的想象。

权力正在各种改革框架的节制下渐渐回归其本质,权力红利虽然短期内不会完全消失,却有不断萎缩的趋势。死磕“铁饭碗”,进入体制围城后却发现出乎意料,届时,这些偏执者们,又该如何转身,又该到何处去寻找安稳的托身之处?以这种执着和韧劲,有很多路可走,为何要偏执一条道理?

深陷特权迷思和体制圈养想象的年轻人,或者该是回归理性的时候了。若以从政为理想、为服务公共而执着,那么这条道路或可以继续执着下去;若企图在体制内寻找安稳和优越,恐怕得醒醒了。否则,权力迷思后的梦想时分,只怕要陷入更深的困惑和迷惘。

□时言平

■街谈

## 设“弃婴岛”是对生命至上理念的尊重

深圳福利中心近期透露,将在明年年初建起深圳第一个弃婴岛。所谓弃婴岛,是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,为弃婴提供室内庇护场所,设置有保温箱、排气扇、被褥,保持适宜的温度、湿度和充足的氧气,来者只需要在离开前按一个延时按键,几分钟后就会有人来将孩子送到福利中心。(11月25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反对者最担心的事情,莫过于所谓的“弃婴岛”会不会变相鼓励遗弃婴儿。从逻辑推理角度看,这是一个伪命题。弃婴者之所以决定弃婴,多半是有着类似生活成本太高无力抚育、喜生男不喜女等更加复杂的现实原因。对他们而言,弃婴是难以回头的一步。即使没有“弃婴岛”,这些已经打定主意弃婴的人仍然会选择弃婴。而“弃婴岛”的出现,不过是给弃婴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好的遗弃地点,使得被他们抛弃的婴儿,不至于殒命街头。

从新闻报道来看,这样的观点也有充分的证据支撑。2011年,石家庄福利中心建立国内第一个“弃婴岛”,也曾引发舆论质疑。而根据2012年2月《中国青年报》的报道,“2011年6月至11月,(石家庄)婴儿安全岛接收婴儿21名,但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是75个,低于2010年同期的83个和2009年同期的105个。”显然,从石家庄的经验来看,一切正如深圳福利中心相关负责人所说,“建立弃婴岛后,被遗弃的孩子总量并没有太大变化”,所谓的设置“弃婴岛”会导致弃婴数量攀升一说,是多余的担心。

当然,弃婴是违法的行为。在我国法律中,弃婴是要以遗弃罪进行处罚。根据《刑法》第261条,对于年老、年幼、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,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,情节恶劣的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而成立所谓“弃婴岛”,似乎是政策被迫让位于违法现象,带有某种纵容味道。但这正如新闻中深圳市公安局一位相关人士所说,遗弃罪中的“情节恶劣”,在执法中很难操作,因而事实上无从对弃婴行为起到遏制作用。而社会问题的对策,并不能简单地从问题本身的性质,是否构成违法着手。因为,被遗弃的婴儿亦是活生生的生命,在相关惩戒性法律形成威慑力之前,公共政策理应对他们的生命权给予必要的保障,设置“弃婴岛”正是这种利益权衡的结果。毕竟,我们怎能等破了所有的弃婴案,再去考虑这些鲜活生命的生存?

“弃婴岛”会不会导致“弃婴”数量攀升,这并不是一个事关“弃婴岛”应不应该存在的问题。讨论“弃婴岛”所可能蕴含的风险,更应该从如何加强对这类新兴收治机构的监管着眼。因为好经就怕歪嘴和尚,公共政策就怕利益掺杂。旨在福泽弃婴的“弃婴岛”,如何避免运行中的风险,需要相关部门未雨绸缪。比如在成立之初,相关方面便应做好风险防范与管理规制,并将其纳入相关的制度监管体系,规范“弃婴岛”捍卫弃婴生命权的职能。

□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

■个论

## 警惕“副职泛滥”背后的“分羹效应”

近日,记者调查全国24个省级行政单位中250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数量。结果显示,尽管各市经济、人口规模存在巨大差异,但6~8名副市长几乎是“常态配置”。据报道,国务院已于2008年明确提出,“国务院各部门领导职数明确为一正四副”,但对地级市应配备多少副市长并无具体规定。(11月25日《新京报》)

对于“副职多”乃至成为“副职超市”的现象,不少人士进行了条分缕析,如管本位意识浓厚等,对其造成的危害也多有批判。但在我们这个当官或者当更大的官,成为不少人人人生追求的“集体无意识”中,最终形成了“副职越设越多”的尴尬。并且,这似乎成了调动不少官员工作积极性的抓手,以至于恶性循环得以形成,多设副职成为当下社会中一种明显的、不断发展的趋势。在笔者看来,这就造成了“官帽市场”和“分羹效应”:官员都想从“副职多”中分得属于自身的“一杯羹”,而丝毫不顾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弊病和行政效率的降低等。

政治学告诉我们,行政

管理与民众的幸福生活密切相关,而民众对行政管理的选择有着明确的标准,一要有效地处理公共事务,二要尽可能地解决问题,三要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社会效果。遗憾的是,泛滥的副职不仅没有体现这些标准,没有反映民众的意志和意愿,而是在破坏公众的选择。

更为严重的是,副职泛滥不仅无法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,而且有可能让政府的有形之手到处乱伸,对社会和市场干涉过度,必然加重政企不分,让政府日益陷入“管了许多不该管、管不了、管不好的事”的泥潭之中。且不说,还可能产生诸多行政成本高涨,行政浪费和行政效率低下以及议事效率降低、官员对官帽追逐的比拼之中。

卢梭在200多年前就写下了“政府越大、官员越多,其效率就越低”的名言。副职太多乃至泛滥,除了影响行政效率,增加行政成本,还有更严重的危害。实践也证明,层次、副职多寡与行政效率成反比,与增加民众负担成正比。有人做过一种估计,一个县多设一个副县长,要增加100小时的协调时间,增加30万

元开支。那么增加一个副市长呢?这是不难推理的问题。

而且,如果副职多与工作无关,问题更甚。当一些官员把正常的工作关系建立在权力分配的利益之上,使权力意识得到强化,忽视了服务功能和对责任因素的考虑,官位利益占据第一位,工作利益退居第二,这必定形成工作关系掩盖下的实质上的私人利益关系,从而导致公仆心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价格判断上贬值,官位的社会价值愈来愈模糊。而正因为如此,“官帽市场”和“分羹效应”应得到制度化诊治,作为官员个体,也应自觉控制“官升一级”的非理性冲动。

必须明确,过多的副职并非是一种必须的制度性安排。常识告诉我们,只有一个地区常态的事务太多、正职忙不过来,以及某个工作专业性太强正职难以准确把握、需设有专业特长的副职来助理工作时,才有设置副职的必要。以此为考量,笔者以为,副职多并非一个简单的编制问题,而是一个关乎公共利益和公众幸福的公共问题。 □朱四倍

■街谈

## “为人民币加油”的理想未尝不可

“加油!努力!为了人民币!”、“梦想将来有很多钱”……11月22日,湖北省实验小学校长张基广翻阅学生毕业留言册后,直言“目瞪口呆”,留言中那些庸俗、功利的价值判断让他担忧。让张校长翻阅学生毕业纪念册的动机是,有六年级的家长反映,看了孩子毕业留言册,班上同学留言让他非常震惊,特地让校长也关注一下毕业班学生之间的留言。(11月25日《武汉晨报》)

都说童言无忌,从“为人民服务”到“为人民币服务”,确实让很传统的教育者感到错愕。自然,如同“我长大了要立志做大官”的理想一样,难免会有对未来一代日益功利、世俗的担忧。从教育者到家庭,再到整个社会呈现出难以理喻之状,并将其作为“垮掉一代”的理由。自然,作为一种现象的解剖,道德的大棒与说教,也似乎应当成为主流。

一度以来,在传统的理想和价值教育里,总是宏大的叙事居多,理想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一样,应远离烟火气,世俗气,否则就会被视为动机不纯。

于是乎,每个人的性格被高度约束,每个人的追求也高度统一。不过,理想固然崇高,现实却很实在。在“为人民加油”和“为人民币加油”之间,总会有一种最符合自身的选择。追求金钱,立志挣更多的钱,这并非令人不齿的低俗。恰恰相反,这正是人性最基本的体现,也是最现实的要求。因为人只有解决了生存的问题,才有可能在精神的追求上有所

提升。如果一个人“独善其身”都无以为做到,其又靠什么去“济天下”?

换一种场景,假若“立志挣钱”的理想是国外小朋友所说,其会引起教育者们的忧心吗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诸如比尔·盖茨等人,中途辍学而去创业,谁能说不是“为美元加油”惹的祸?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们,哪一个又不是“以挣钱为目的”?而其社会责任的体现,也恰恰在其有了钱之后,才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。对为“人民币加油”式的理想,尤其需要辩证法看待。

人不是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”,其注定有着七情六欲的释放。所谓的理想,也不能脱离最基本的人性需要,“要娶一个漂亮的老婆”之类的理想,恰恰就是每个具体的追求,也是最直接的现实诉求。真正令人错愕之处恰恰在于,所有的理想、价值都有着太高的道德要求,而恰在这种道德洁癖之下,形成了人性的漠视,对个人权利的忽视。宏大的道德叙事下,少了最基本的个体考量。

胡适说过,争你们个人的自由,便是为国家争自由,争你们个人的人格,便是为国家争人格。自然,争取个人的理想,也是争取国家的理想。为“人民币加油”未尝不能成为人生的理想,这样的理想没有崇高与低俗之分,真正成熟的检验,不在于对理想的标准化、教条化和僵硬化,并以此作为个人评判的依据,而在于如何尊重每个人的理想,使他在规则的范围内去实现,让每个人都有“免受干涉的权利”。 □堂吉伟德